# 名存“宝顶”

## ——《大足县志》里的清代知县王德嘉

□ 杨中秀

据1996年版的《大足县志》“清知县名录”中，大足清代有108名知县，这其中，王德嘉的名字在其间是受到后世尊崇者之一。

王德嘉（1816—1877年），字仲甫，号筱垣，陕西城固人，出身拔贡，这“拔贡”是清代每十二年（即逢酉岁）一次，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，贡入京师，称为拔贡生，简称拔贡。同时，经朝考合格，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，二等任知县，三等任教职。可见，当时王德嘉在其省内应属于“文行兼优”者。王德嘉于清代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开始担任大足知县，至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新知县杨锡荣来任，期间在大足为官最多约四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王德嘉来到大足担任知县的时候，他已经是56岁之际，其在大足一地的四年间，至少有以下事例，迄今仍令世人铭记。

南山文峰塔。

宝顶山王德嘉书“宝顶”。

劝养桑蚕，助农生产。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知县罗德培曾教民种桑。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王德嘉购买十余万株柔桑，在县内广泛种植，并增设养蚕局。同时，还增刻《蚕桑须知》以及自作诗歌，颁发给各乡村民。在增刻的《蚕桑须知》序言里面，王德嘉说道他来大足之后，发现“种桑者，百无一二，甚异之”。在他看来，大足一地的土壤适合种植桑树并养蚕，“以助农之不足”。由此而作此序。其后在《劝养蚕歌》中，写道“衣食本同源，农桑须并务。务农不务桑，歉岁何以度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遇到灾荒之年，那百姓如何应对呢？因此，要倡导“自古织佐耕，田家多乐趣”的生活状态与准备，农家才会有基本的保障，从而可以过上“上以奉高堂，下以完嫁娶”的生活，即或是遇到“天灾偶饥馑”，也“流亡复何懼。”从这一点来看，王德嘉具有以民为本的理念。

以其书艺，增添景观。据初步统计，王德嘉在南山石刻中题写有5件碑刻，宝顶山有2件碑刻，另，南山“文峰塔”题刻亦为其书写。这些碑刻书法，具有较高的书法水平。在《大足历代书法选》（九州出版社，2019年）一书中，就收录了其个人作品6件，可见其书艺。其中，南山的碑刻中，选取了王德嘉隶书碑，正文40字，节选自汉代隶书书法名品《史晨碑》，为光绪元年（1875　年）由王德嘉临摹，并刻石于此。此碑书法严整匀称，宽严得体，其法度森严，中规中矩，极具功力。王德嘉行书碑刻，可谓是自然生动、大小错落、布白有致、洵为佳作。“寿”字碑，碑心阴刻“寿”字，楷体，高1.70米，宽1.17米，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书写。此字端庄雄伟，方正而敦实，笔锋显得刚劲有力而饱满。之外，还有“绝尘”题刻碑。宝顶山碑刻选取2件。一为其书写的张澍《前游宝顶山记》碑，碑文长达1379字，书写于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史称“文词博丽，书艺上乘，刻工精美”三绝。另一件为“宝顶”二字题刻，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刻于今宝顶山大佛湾南岩，楷书横刻“宝顶”二字，高1.65米，宽1.25米，笔画深0.07米。对于此件佳作，前引书中评道“其书法亦颇厚重绵密，形成一种端庄森严，浑朴苍雄，堂庙古拙的艺术风格。如千仞壁立，气度非凡，颇有万壑千岩齐奔腕下之气概。”从这些书法佳作来看，王德嘉以其自身的才艺，为大足文化尤其是书法上，增色不少。

颁发禁令，保护石刻。今大足中敖镇附近的一山上，有一凸显的巨大岩石，其中一半的岩石上有造像，即舒成岩石刻，其雕刻年代在南宋绍兴十三年至二十三年（1143—1153年）之间，其造像基本上为道教题材，是考察研究宋代道教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。然而，在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王德嘉接到中敖场团首的禀报，此处石像无人看管，因在岩石旁边搭建有一半的建筑，故当时称为“半边庙”，在这时，一些乞丐僧道以及面生的不法匪人，在此地居住。经过多次训斥不听，反而形成仇恨。为此，特向知县禀报，希望能“免酿祸端”。为此，王德嘉立即下发“示禁”令，倘若不遵守规定，立即由当地人予以驱逐，如果恶霸不听，准许立即报案。王德嘉的这道禁令，其后被刻在石壁上，遗存至今。而今，这处石刻于2019年，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由此可见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。

营建南塔，培育文风。在大足宋代修建的北塔南边的一处山上，矗立着一座实心的石塔，俗称为“南塔”。该塔通高约15米，分为塔基、塔身、塔刹三部分。塔基为圆形，直径4.8米。塔身有9级，由下向上逐层内收，第一级塔身由六排条石砌成，第二级塔身由五排条石砌成，由此向上作递减。塔檐由两级条石构成，形如圆鼓，外凸塔身。塔刹为宝珠形。在塔身一面，从上至下第四三二级阴刻“文峰塔”3字，直径1米，在左右有署款，可知为王德嘉于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主持修建而成。“文峰塔”，在古代具有是一种对文化追求的象征，代表了世人对于教育的尊崇，激励学子们对学问的追求。王德嘉主持营造该塔，其目的也在于对大足文风兴盛的祈愿。

兴办义学，重视教育。清初，规定要在各个州县的大乡镇上设立义学，大约相当于一种免费的学校，其资金来源为地方公益金或私人筹资。大足一地至清代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，知县狄廷飏捐银并向社会募捐资金，设置了13斋（即义学）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王德嘉在没有学塾的场上，增设了7斋，即玉龙设玉成斋，大堡设大雅斋，高升设双壁斋，回龙设龙文斋，万古设古香斋，十万设万选斋，云路设青云斋。至此，大足全县的义学达到了20斋。同时，王德嘉还增加教师们的工资，从而使得全县的义学颇有起色。

续印县志，传承文化。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由王德嘉主修的《大足县志》竣稿。王德嘉在《续修大足县志序》中，说了他的一些想法，当他来到大足担任知县之后，翻阅前部《大足县志》，感觉山川、风土、人物“朗若列眉”，也就是写得非常清楚、明白。特别是对于之前知县张澍所编的《大足县志》，可谓是“复极精密，而文词质古，尤有古良史风”。但是，前部县志刊刻于道光年间，距离当时又有三、四十年了，因此，对于王德嘉而言，他又怎么敢重头再起去编修呢？因此，只有将这些年来大足一地的“贤达、循良、孝义、忠贞”等逐一编入，以此作为作为答复和对前部县志的尊重。在序中，他还说志书“有关风化，惟求传信，以资劝惩”，也就是说，续修县志，其实就是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作用。

一百多年瞬息而过，如今，宝顶山大佛湾的“宝顶”二字，依然矗立于崖壁之上。每天，往来于此的世人大多要在此地驻足仰望，心间默念着“知大足县事城固王德嘉敬书”等碑文，这其间，不仅仅是对其书法的认可，更多的是对他在大足一地四年间的光阴里，有所作为的认可！

# 大足石刻记

□ 魏冬生

重庆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环渝皆山也，岩壑峥嵘，江流宛转。余自渝中往西行百二十里，至大足，寻石刻佛国，探梵音秘境。

初入宝顶，山高云深，林幽径曲，少顷，至山间，突见崖壁千仞，佛龛错落，气象甚伟。其中有千手观音，高可三丈，妙相庄严，千臂如莲，目若垂星，观者无不悚然屏息，如面真佛。忽转崖角，豁然天开——峭壁如削。华严三圣巍峨其间，高逾十丈，法相慈悲，神态安然，目光触及，心弦一颤。复行数十步，见卧佛横亘三十丈，半身隐于石，眉目安详，已入涅槃之境。四顾崖间，群像环列，或坐或立，衣袂翩跹。佛经故事镌于石上，牧牛图、轮回塔，皆寓教化，融儒释道于一窟，世情人间，尽显其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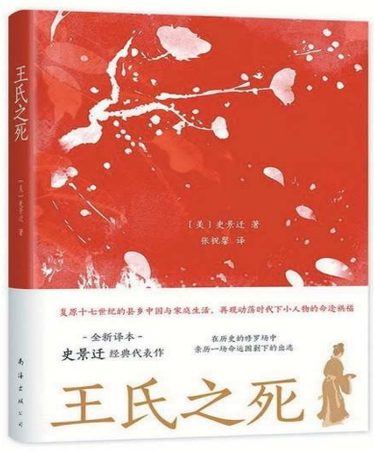
暮色四合，倚栏而望，山霭苍苍，钟声杳然。嗟夫！昔者匠人运斧，凿混沌以现妙相；今我辈仰观，临虚空而悟真如。纵使沧海桑田，一念慈悲，自照大千。

（作者系河北省沧州广播电视台精品创作工作室主任）

# 《王氏之死》

## 透过历史切片向我们传递温度

□ 泥文




小人物命运的运行是事件发生的本身，也是时代进程中编年史的落脚点。这是我看了历史性叙事书籍《王氏之死》产生的想法。

美国诗人詹姆斯·梅里尔说：“逝去的，被埋葬了吗？还是又一块缺失的碎片？”很显然，历史学家史景迁（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、汉学家）用他的方式从大量的史料中捡拾散落的历史碎片，缝补1668年到1672年间发生在山东郯城人身上的故事，为我们钩沉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切片，让我们从中去认识、感受和体悟那个历史阶段的中国，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中不可抹掉的事实。

《王氏之死》是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的一种叙事文本，使人读来轻松易懂、易记，不像学术性太强、太专业化的历史读物那样呆板，但却是在尊重历史、书写历史的情况下展开的。据附录，其参考文献达56种之多，注释数百条之多，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史景迁在动笔之初是做了大量的考证和功课的，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可见一斑。《王氏之死》的写作，史景迁是持悲悯情怀的，在还原一些故事的情况下，揭示了清朝时期的平民、小人物，在政治境况和自然境况双重盘剥之下的艰辛苦难程度，且在女性身上凸显得更加淋漓尽致。

史景迁在序里说，《王氏之死》是在4次小危机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和写作的。一次是“土地耕作及赋税征收”，一次是“一名寡妇试图保护其子嗣及遗产”，一次是“地方恩怨引发的暴力事件”，还有一次是“姓王的妇人无法再忍受生活现状，选择逃离郯城”。就本书的组成部分看，书名为何叫《王氏之死》？正如史景迁所言：“本书始于妇人王氏，自然也终于王氏。”也就是说，他写这本书是因黄六鸿记录的“妇人王氏”的故事触动了他写作的动机，“她引我进入郯城，引我发现郯城历史的悲痛，引我第一次了解一个在所有可见的财富、影响力和权力都分配不均的边缘县城。”

郯城在清朝康熙年间及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？据1668年任郯城知县的冯可参，1670年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编纂的《郯城县志》，以及黄六鸿卸任后的回忆文章显示，郯城在天灾（地震、蝗虫、洪水、雪灾等）、人祸（白莲教、土匪、清军入关等战乱）面前，地震死之，匪患、兵乱杀之，无食饿而死之……“四年之奇荒，七年之地震，田禾颗粒无收，人民饿死大半。”有因无法生存而自尽的，也有因生存而卖妻卖女的。尽管在如此条件下，赋税、兵役的摊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，成为悬在郯城人民头上一把血淋淋的利刃。本就势弱的女性群体，在这样的境况下就更不值一顾了。

《王氏之死》引用了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里如《盗户》《上仙》《偷桃》《绛妃》《促织》《绩女》《细柳》等故事。借他收集的来自亲友讲述、游历见闻的民间轶事，为《王氏之死》的写作铺陈肌理。这些奇异非凡、奇思妙想的故事，从表面上看，史景迁对它们解读阐说，其实他是用了一种反证的手法来证明是时大环境下平民、小人物的生存状态，用这种状态来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，也用这种方式让那一时期发生在郯城人身上的故事活泛起来。

《王氏之死》涉及的妇女故事不只是王氏，作者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比较典型的故事。当然，多数是借了蒲松龄之手，也深入到了大清律例的底色。如，“其改嫁者，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，并听前夫之家为主。”“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，合承夫分，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。”也因这些条例给成了寡妇的妇人带来了悲惨的命运。族人会想方设法让守寡的女人改嫁，以期获得本该属于她的财产。更有甚者，用计谋杀掉守寡妇人和妇人的孩子来占有其财产。如《郯城县志》有简短传记：“是时，家业尽空，兵荒盗起，人无宁居。氏以弱孀幼子，孤伶苦守。族人又逼嫁而谋其产。氏毁容破面，死不再适。”诸如此类，无一不彰显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和弱肉强食的本色。

作为一位外国汉学家，史景迁站在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角度，去挖掘王氏所代表的广大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，以及这种命运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。我们能看出他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同情，这是他试图跨越历史与文化的鸿沟，以一种更贴近人性的方式，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中那些被忽视的平民、小人物的温度。

《王氏之死》是一部文学性比较强的历史读本，作者用严谨的笔触挖掘史料，借《聊斋志异》故事里的奇幻，为我们与彼时的平民和小人物之间搭建了一个通道。其用笔是理性与悲悯、事实与想象、沉重与浪漫相互糅合、相互渗透的。他用层层剥茧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清朝时期郯城人民的情状。彼时政治与经济、自然与人文、朝堂与民间、男性与女性等之间的关系具现，如亲见般震撼人心。

### 首次用小说完成故宫文物南迁叙事，《国宝》作者祝勇说——

# 读懂故宫，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

□ 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

“不管过去了多少年，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，丈夫那文松在薄雾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，是公元1933年2月5日。”

这个富有韵律的句子简洁有力，在看似从容不迫的氛围中，那文松和梅遇影的命运渐渐“失控”，涓涓细流的儿女情长与波澜壮阔的家国情怀奇妙合流。他们的人生，即将开启未知的旅程。

那未知的旅程，与故宫文物南迁的隐秘征途密不可分：1933年2月，山河飘摇之际，如那文松般的故宫人，带着首批13427箱零64包文物离开北平紫禁城，开始漫长的迁徙。

2025年，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。是年春天，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、作家祝勇用本文开篇那个句子，展开了长篇小说《国宝》的叙事，为这部60万字的鸿篇巨制，埋下了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。近日，祝勇接受了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专访。他说：“素以坚韧、忠勇著称的重庆，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”

## 记忆重构

“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，在我心里呼之欲出，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”

“600年的宫殿、7000年的文明，一个人走进去，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，立刻不见踪影。”从2002年的首部故宫主题作品《旧宫殿》出发，祝勇开始与故宫持续对话。20余年来，“故宫”已成为他鲜明的文学标签。

“故宫是最好的历史现场，是我写作的灵感之源。她不只是我的写作对象，更是我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。故宫文物南迁历史非常重要，我将它视为立足故宫观察中国史的新探索。”两年前，祝勇以非虚构作品《故宫文物南迁》填补了南迁历史书写的空白；如今，两卷本的《国宝》成为了南迁叙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故宫文物南迁有多重要？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，故宫文物危如累卵。为安全考虑，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的部分文物和北平古物陈列所、颐和园、国子监等处的1.9万余箱，分批南迁：文物被运离北平，先至上海、南京，后又分南、中、北三路，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。分别辗转至贵州安顺、四川、重庆、陕西汉中，最终转移至四川的巴县（今重庆巴南区）、乐山和峨眉临时库房存放。这场历时20余载、横跨10余省市、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行动历经磨难，但相关文物几乎无一损毁、遗失，基本完整保存。

“站在今天来看，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。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今天足够久远，有关它的细节已漫漶不清；同时也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。因此，不断书写，很有必要。”祝勇说，非虚构作品完成后，他依然觉得有很多话想说，“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，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的脉络叙述，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。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，在我心里呼之欲出，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。”

## 聚焦个体

“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、事、物众多，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，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”

过去20多年里，祝勇的故宫写作主要在散文领域。他认为，散文更多要依靠作者对于某个事物的感受，通过一种认知的思考来呈现文本，小说则要讲求叙事，在叙事之上，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人物的塑造。“小说要贴着人写，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，通过人物的精神面貌，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。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、事、物众多，细节纷纭，如何从中找到一个故事主线、人物主角？我从参与文物南迁的学者、知识分子、工友中寻觅，最后决定聚焦一个普通个体。”

小说《国宝》围绕主人公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，从他个人的家庭悲欢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。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、南京，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，分为北、中、南三条路线。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，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：沿陇海铁路西行，先存宝鸡，后穿越秦蜀古道，迁于汉中、成都、峨眉各处。

围绕那文松和身边人的视角，读者眼前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图景：没有难民，没有枪炮，唯有穿草鞋的学者、扛木箱的挑夫、驾卡车的士兵，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。十数年间，过长江、越秦岭、入川渝，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、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。无数无名的人参与运输，通过文学的显微镜，让那些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“那文松”们重获面容。

## 重要节点

“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、包容精神，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坚实支撑”

书中对战时重庆的书写细腻而感人。彼时的重庆虽然随时可能遭遇日军轰炸，但市民生活却生动鲜活，大街小巷一派积极乐观的景象。

为了故宫文物南迁写作，祝勇曾多次到访重庆。在他看来，作为反映故宫文物南迁这一重大历史的长篇小说，《国宝》必然要有相当的笔墨来写重庆。“1937年，在淞沪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的背景下，已经从北平迁到南京的故宫文物紧急迁出南京，开始分成北、中、南三路进行西迁。中路是从南京出发走长江，经过武汉，抵达重庆；南路是从南京到武汉，向南经过长沙、桂林，再抵达贵州。但随着战局的发展，重庆、贵阳这样的西部地区也遭遇了大轰炸，所以，重庆存放的中路文物，继续西迁到了乐山，南路的文物又从贵阳到达了四川巴县（今重庆巴南区）。抗战胜利后，北，中，南三路文物集中在重庆。然后，大部分文物又从重庆出发返回南京。所以，在故宫文物南迁进程中的西迁和东返两段过程里，重庆都是特别重要的节点。”祝勇如是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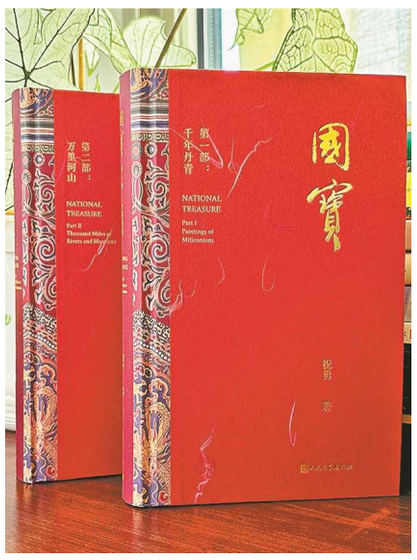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进入重庆部分时，为何以风和日丽起笔，随即笔锋一转，让主人公目睹一场狂轰滥炸的屠杀？“这是有意为之。”祝勇说，重庆自古为长江上游重镇，烟火繁盛，小说进入重庆，通过勾勒普通国人日常生活场景去跟侵略战争的惨烈形成反差对比，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控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的伤害。“这种对繁华市井的描写和对战争惨烈景象的描写，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相辅相成，表达了对侵略暴行刻骨铭心的痛恨。”

书中不仅写了重庆大轰炸，还写了四川嘉定（今乐山）大轰炸。祝勇颇为感慨的是，面对战火，川渝人民的坚强乐观，也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。“这种坚强乐观是很值得学习的一种品质，让故宫人在西南大后方感受到强烈的信任感。我在调研采访过程中有许多切身感受，比如我在重庆看到一张大轰炸后的历史照片，楼房已经被炸塌了一半，但另外一半作为饭店还在照常营业，还在卖包子、油条之类食物。还有在一片废墟里，重庆人还在打麻将。你看，炸归炸，日子还照常得过。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、包容精神滋养了坚守抗战的人民，更为文物南迁这一保全中华文明的重大事件提供了坚实支撑。”祝勇注意到，重庆不久前提炼出“坚韧、忠勇、开放、争先”的城市精神，他认为这一表述语高度契合重庆的城市特质，承载往昔，映照未来，概括了这座城市一路走来的风骨与灵魂。

## 以史为镜

“回望九死一生的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‘流亡路’，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”

文物有情，文脉相牵，大国器物之上凝结的是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。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曾说：“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，在于希望人们在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、有鉴戒、有以历史为镜的态度，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。”在祝勇看来，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对于今人也有“以史为镜”的意义，“文物南迁九死一生，多年后大部分重返北平，回望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‘流亡路’，不单对故宫人，我想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。”




《国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以《国宝》为题，祝勇全力以赴，孜孜以求，以该部长篇小说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构。祝勇希望深掘藏在文物背后的人性、人心，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探寻文明变迁和精神来路。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源于五千年历史文脉，岁月交替，文脉赓续，在今天依然在滋养着我们。”他说，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，往事并不如烟，“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、固化。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，是历史，是哲学，也是法度。”

从2002年的《旧宫殿》算起，《国宝》已经是祝勇笔下第12部故宫主题作品了。20余年，洋洋洒洒数百万字，祝勇构建起的“纸上的故宫”，亦是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。

执着书写故宫的根源，在于祝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痴迷。如今，已经成为新时代资深故宫人的他，这样回忆与故宫的几十年缘分。“我大学毕业留京工作，经常逛故宫，故宫的美我怎么都看不够，至今我去看那些巨大的宫殿仍然无比震撼，因为故宫的确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，渐渐地故宫就成了我的写作主题。”祝勇表示，“从器物、历史等不同面向的丰富角度去不断书写故宫，可以呈现一个开放的故宫，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，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、读懂故宫。读懂了故宫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就是中国人的‘精神家底’，它将永远滋养我们的心灵。”